



在美國的犯罪行爲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226(61)
Q346

新華時事叢刊
第79種

在美國的犯罪行爲

何理良譯
顧世榮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0883 (53—079)

在美國的犯罪行為

譯 者：	何	理	良榮社
校 者：	顧	世	社
編 輯 者：	新	事	刊
出 版 者：	華 時	叢	版
發 行 者：	民 出	書	社
印 刷 者：	人	李	廠
	京	放	印
	解	胡	刷
	(東四卷種)	同	(乙)
		十一	號)

1—7,000[京]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版
基本定價(乙)0.90

目 錄

- 一、資本主義總危機之加劇與資本主義國度內罪行之增長.....一
- 二、美國犯罪行爲普遍化的幾個材料.....三
- 三、在美國犯罪行爲之組織性.....五
- 四、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的犯罪行爲.....八
- 五、幾個結論.....三〇

附 錄

- 美國兒童的墮落.....K·邱可夫斯基 三七

一、資本主義總危機之加劇與

資本主義國度內罪行之增長

資本主義的本性決定了罪行的存在及其不斷地趨於猖獗。階級的對立，週期性的經濟危機，被剝削羣衆的生存毫無物質保障，大批人的失業，對婦女與兒童勞動的剝削，勞動羣衆生活條件之極端窮困，個人與資產階級社會及法律制度之間不斷出現的衝突，基於資產階級虛偽的道德之上的家庭與婚姻之分崩離析，——所有這些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以及與此制度直接相連的人們的生存條件，便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罪行的基本原因。

在帝國主義時代，犯罪成為更加普遍的現象。不僅那些被直接的剝削、匱乏與貧困逼得無路可走的無產者，而且連生活較為有保障的階層也淪落為罪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無政府狀態、競爭、追求利潤，注定了投機、欺詐、欺詐破產、謀財害命、對資產階級國家機構的顯要人物之賄賂、強大的犯罪惡黨之建立、兇殘卑劣聾人聽聞的罪行——暗殺、姦情等的空前增長。罪犯具備最新的技術：盜賊偷竊時儘量利用一切資本主義技術，從前用棍棒斧頭「攔路搶劫的土匪」，現在已讓位給使用汽車和金屬鎚接機、手提機關槍和催淚性瓦斯的強盜了。那些罪犯惡黨結成最新式的組織——完整的強盜「托辣斯」，不但犯罪圈子裡，而且政治舞台也成了他們的勢力範圍，他們在政治活動中變得越來越明顯和更有影響了。在許多帝國主義國家裡，犯刑法分子和這個或另一個統治集團的

代表人物接近到令人懷疑的程度。

資本主義正在它自身的各種矛盾中苟延殘喘，而有着新式組織的罪行便是這些矛盾的鮮明表現與暴露的一種。

對資本主義國度內罪行之普遍情形只要用粗略的數字（精確的數字是沒有的）便可以判斷。每年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裡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居民因犯了種種罪行而遭到審判。

若是全世界人口的估計在十九世紀平均是十五萬萬人的話，那麼，很明顯，在資本主義國度內每年有兩千到三千萬人因犯罪而受審。但這個數目依然還沒有反映出罪行的真實規模，因為受審的只有真正犯了罪的人的幾成而已。

在資本主義國度裡罪行之增長，可以用下列材料劃出一般的輪廓。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為警察局所偵知的犯罪案有九萬七千多起；在第二次大戰前，在一九三六到一九三八年，為警察偵知的犯罪案則已增加到二十六萬六千起了。如此，英國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犯罪行為增長了一倍半。在加拿大，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〇年二十年間，犯罪行為也增長了一倍半。一九二一年受審人數為一萬九千人，而在一九四〇年則已達到五萬二千人。

對職業化的罪行之增長，可以從下列材料中判斷。在三十年代每一百個受刑犯人中的累犯，即從前已因犯罪受審的人，在比利時有四十二人，在意大利有三十八人，在瑞士有四十五人，在美國為三十三人。這樣，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的受審者成為陷入犯罪的深淵的人。此外，為了一般地說明資本主義各國罪行增長的情形，還應該舉些青年人犯罪的材料。在英國，坐牢的犯人年在二十歲以下的平均每年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這樣一來，每兩個犯人中便有一個是未成年人或少年。

二、美國犯罪行爲普遍化的幾個材料

美國在罪行之程度與增長速度方面，在罪行影響美國的社會生活方面，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名列前茅的。這一現象，當然不是偶然的。這現象證明了上述的那一原理：犯罪是剝削制度之產物，而這制度內的矛盾越尖銳，則作爲基於剝削基礎上的社會解體表徵的罪行增長的過程便來得越顯明。

三十年前，列寧曾在他的「致美國工人」信中明確地闡述了美國的歷史，並揭發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真正實質。他說：「現代的文明美國底歷史是以一個偉大的、真正求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戰爭作為其開始的，這樣的戰爭在由於帝王之間、地主資本家之間爲瓜分侵略來的土地或掠奪來的利潤而引起的無數次掠戰爭（如像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那樣）中是爲數不多的。這便是美國人民反對英國強盜的戰爭，英國人當時壓榨美國，把美國置於其殖民的奴役中，一如那些「文明的」喝血魔現在還在壓迫奴役印度、埃及和世界各個角落的千百萬人民那樣。」

從那時起，已過了一百五十年了。資產階級文明帶來了它一切奢華的成果。美國在各個「自由」的「文明」國度中，其大規模勞動的生產力發展之高超，機器及最新式技術的奇蹟之應用都佔了第一把交椅。但美國同時又成了第一個在一小撮卑陋無恥驕奢淫泆的百萬巨富和幾百萬永輩生活在貧困的邊緣上的勞動者之間鴻溝最深的國家。曾經向全世界提供其反封建奴役的革命戰爭範例的美國人民，現在處於一撮百萬富翁的資本主義僱傭新的奴役之下，扮演着僱傭剝子手底角色……」●

對美國的這一特性的描寫是一把鑰匙，足以發現那些決定這先進的資本主義強國內犯罪性質和規模的原因。

要作出對美國的罪行性質的概述，首先應利用美國人——學者、政治家、政府的官員自己提供的材料、數字與報導。在美國，公佈罪行問題的書報是很廣泛的。罪行問題是法律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醫學家、政治家們心愛的題目。犯罪事件貫穿在美國的報紙、廣播與書籍裡。每星期有一萬萬以上美國居民去看以犯罪為題材的電影。在聯邦調查統計局活動的影響下，美國偵探人員更在報紙上，在電影和書籍中予以廣泛宣傳。報紙以極大的注意去描寫罪行，尤其是聳人聽聞的謀殺案、搶劫和勒索等等。據美國研究家自己的統計，每日出版幾百萬份的美國報紙，登載犯罪新聞的篇幅佔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有一個作者估計，只須十二家美國報紙一個月內便登載了如此之多的罪行報導，簡直可以編纂六本各有三百頁的大書。

關於美國報紙極端注意登載美國的罪行一事，莫洛托夫同志還在聯共黨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便已經說過：『美國雜誌不久前統計一九三一年在報上和照片上登得最多的資產階級的「一代英雄」。結果，不是別人，而是芝加哥的強盜頭目阿爾·卡波奈打破了紀錄。他的軼事的紀實、他的傳記、他的談話等在世界報紙上佔了一百五十八萬七千四百二十二欄。此外，報紙雜誌上還登了他五千○五十幅像片。而只是第二位才輪到美國總統胡佛。』

如何解釋美國人對罪行興趣之增高呢？這答案須要從資本主義美國的生活特點中去尋找，在犯罪行為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生活所有空隙中去尋找。P·I·留布林斯基教授在其『美國的警

● 『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七八——一七九頁。

● 莫洛托夫：『在為社會主義的鬥爭中』。見『莫洛托夫哲論集』第三一四頁。一九三五年版。

察、法庭與監獄」一書中曾這樣解釋美國人對犯罪行爲興趣之增高：「對於如火薑製造商、商業的騙子和地位較低的職業家等許多商業家們來說，犯罪只不過是能使他們飛快地致富的投機買賣、他們的「商業」而已。對於「有身份的」資本主義集團，這是競爭活動的總結算，同時也是爲自己的資本安全而爭擾的來源；對於大羣政治上的主宰者們，警察和法庭，這是「外快」的着落。最後，對於其他廣大人民，則是苛重的賦稅，他們不得不交納這種賦稅以支持資本主義統治現存制度的一切「美妙景象」。

當人們說到美國的工業時，一般都把鋼、石油、汽車、電影等等稱爲基本工業。但這時，人們總忘記一種基本工業，這種工業公道點說來還應當居第一位，這就是罪惡製造業。」●

誠然，美國的罪行規模是可以用各種方式去評定的。這裡所舉的當然只可能是極其粗略的統計。根據《美國刑法雜誌》在一九三二年公佈的材料，三十年代美國每年有將近四百萬宗犯罪案發生。如此，有一千六百萬美國人，即是美國人口百分之十三，陷入了犯罪的泥坑。據《紐約時報》一九二五年發表的材料，罪行的「代價」每年被確定爲一百億美元，直接因罪行而引起的損失爲三十五億美元，爲與罪行作鬥爭而花費的間接損失爲三十五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爲二十五億美元，因賄賂、勒索等產生的損失爲五億美元。平均分攤一下每人因犯罪而損失八十一元三角，並且還指出一九二五年罪行的「代價」比一九〇一年增加了十倍。根據另一些統計材料較詳盡的研究，美國在三十年代每年發生將近五十萬宗重罪案和一千萬宗輕罪案。

美國的研究家們是非常清楚罪行之成爲美國社會——經濟生活的有機部份已達到何等程度。如在一九二八年的一個調查書中指出，美國的商業欺騙數達五億美元，信用欺騙約有二萬六千五百萬美

元，而偷盜、搶劫和勒索造成的損失有一億美元。據保險公司的統計，每年因登門入室的盜竊，造成損失數達五萬二千五百萬美元。信用組織聯合會斷定由欺詐破產與詭騙而引起的損失有四億美元。據一九二四年收集的統計，美國因無力付款而破產的有一萬〇六百一十五起，數在五億四千二百萬美元，其中將近一半破產是欺詐性的。

在這裡不由得記起了恩格斯的幾句話來，他說：「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下，任何人部分不清正當利潤的終點與欺詐的起點之間的界限。」●

關於美國在二十世紀初葉的二十五年中罪行情形的概況，當時有一位最高檢察官曾確認說，全美國正泛濫着犯罪的巨浪，它正用那血腥的巨流吞沒千百萬人。在美國境內，每二十秒鐘便有一件嚴重的罪行發生：如兇殺、搶劫、強姦、偷盜等。一年間發生了一百五十萬起大罪案。每四十八個美國人中有一個是罪行的犧牲者，每十六家美國人中有一家被搶劫過。一年間有一萬二千美國公民被殺死，即每天平均殺死三十三個人。有五萬人被搶得精光。有十萬人遭遇過搶劫的襲擊。最高檢察官在確認這些事實時指出說，情況一天比一天更具威脅性了。

下列總結可以告訴我們美國在二十世紀頭三十三年中犯罪情形的一些概況：美國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三二年謀殺案數字增長了三倍。

應該指出，在美國兇殺案數目比荷蘭多二十八倍（美國人口為荷蘭人口之十五倍——譯者），比英國多十七倍，比比利時與未法西斯化的德國多四倍，比意大利多兩倍。

美國犯罪行爲的醜陋而又高度表現的景象，甚至美國的研究家也予以承認。例如，賓夕凡尼亞大學的教授塞林在形容美國在這些年份的犯罪行爲時說：「法律與制度的力量在日甚一日的犯罪行

爲與聾人聽聞的謀殺面前好像毫無作用似的。轟動社會的審判和有組織的罪行好像變成對法律和制度的譏諷，而且，這一切不但沒有因日益增漲的物質享受而減低，相反，好像更爲增加了似的。另一個研究家霍福曼也承認說：『法律庇護下收集財富最容易的往往不出乎犯罪的方法。正確與虛假的方法的分界常因了解不足而混淆不清。不得不作一個令人不快的結論：誰也沒有像犯罪生涯那樣得利大，這種生涯是被無視法律和危害美國守法人民的神通廣大的律師非常巧妙地造成的。』

三、在美國犯罪行為之組織性

美國的刑事罪行是有組織地進行的。最廣泛的是由強大的犯罪惡黨所準備、所組織、所遂行的罪行。

通常，罪行由專門從事這方面活動的人周密準備，他們調查罪行的犧牲者，研究使罪行能以最有效的方法遂行的條件，編製計劃。另一部份人是實現罪行的，他們必須具備足夠的『機敏與體力的素質』。惡黨的首領的任務在領導遂行罪行。然而，他的作用並不出於在技術上組織罪行和領導完成既定的計劃。惡黨的犯罪活動真正的組織者似乎並不滿足在單純犯罪的世界裡。這樣的人，或者是計劃罪行的總領導的經紀人，或者是買空賣空的巨商，他是完全合法的人物，在財政、工業、商業的『事業家』集團中，與警察署和法院機關有着必要的事務上的聯系。

這樣看來，犯罪組織便是經常活動和深為秘密的，又與美國各個實業集團密切相連的黨了。有組織的罪行聯合了一大批犯罪分子，這些人中間有本『行』的高明專家佔着顯要的地位，他們與社會各界銀行家、政界要人、大商人、工業家都有密切的聯繫。有組織的罪行——這是十足的資本主義企業，連同其上層領導機關和許多基層機關，是一種犯罪托辣斯。有組織的罪行還網羅了警察署的人員、法官、檢察官、官吏和個別資本主義企業的職員進入犯罪活動的境界。這樣的犯罪托辣斯像有兩個面孔似的，一個是合法或是幾乎等於合法的，一個是十分秘密的，——不合法的，犯罪的。再者，在許多場合下，這種秘密性是很有限的，只有一層極薄的薄衣而已。

有組織的罪行——在美國不是偶然的和迅速消逝的現象，而是典型的、日益廣泛發展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是國家政權機關無力克服的。美國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些情形。如科林斯在其「平時與戰時之聯邦調查統計局」一書中，把美國有組織的犯罪行為描寫得淋漓盡致，他寫道：「罪犯們結成了許多全國性的組織。他們大多數並不是甚麼「破落戶」，而完全是出身於美國社會高尚階層的人。他們常常是從非法販賣酒類飲料開始其犯罪的生涯，當時他們認為這「沒有甚麼特別」，他們不知不覺地「越出了軌道」。大罪犯的同謀者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而首領本身在「工作」之餘出入於美國社會最好的階層，住着最好的旅館，出現在最時髦的飯店，從事體育活動，在郊區的別墅裏休息，在旅行家最愛遊的地方休息。強盜在任何地方可以找到志願者和助手。他在任何时候都享有一切必需的東西：政治方面的支持，法院的建議，醫藥救護，錢，賊窟，女人。多少醫生因爲與強盜同謀而被監禁呵！其中有許多醫生因做改變指紋的表皮手術，因給罪犯醫治而不報告政府機關，每次能拿到二千五百美元。有許多在司法機關裏的人員也牽涉在罪案中，有許多人因賄賂而遭放罪犯。大家都十分清楚，判罪或宣判無罪，主要是由檢察官決定的……許多檢查官因罪犯與政治集團有關係，爲了保持在政界的地位起見，不願使自己與罪犯爲敵。這時檢察官的判語中便會出現「罪證不足」的聲明，或給罪犯提出控訴一件小罪案，這時嚴重的罪行使化爲烏有，也有時給記者發表一則關於偵緝過程的談話，這樣一來，原來有危險的人便警覺起來。司法當局人員縱容罪犯的政策在社會上有勢力人士集團——商人、工廠主、國家要人中得到了廣泛的支持，社會上有勢力集團深怕社會醜行會引起他們財政利益上的損失，他們便設法堵住罪犯的口，甚至威脅到自己家庭的安樂時，也在所不惜。」

在美國，犯罪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在強盜世界與銀行家、工業家、商人的世界之間，在強盜、劫賊、小偷、勒索者世界與國家偵探、私人偵探、警察、檢察官、推事的世界之間的界限已

被擦去了。尤有甚者，當你研究強盜活動的形式時，有一點是非常令人觸目的，這就是強盜活動的組織與合法的資本主義組織——托辣斯、商業公司、銀行等的活動之類似。這會有許多學者和作家指出過。我們只須記起艾普頓·辛克萊、辛克萊·路易斯、費道爾·德萊塞、傑克·倫敦的著作便够了。關於純粹犯罪世界與『誠實的』美國商人世界之間界限的消失，艾爾·華爾福特的小說『大盜狄克』中，在T·斯特里布林的小說『擴音機』等等裏都有生動的描述。

美國『有組織的罪行』由於禁酒輸入法令的施行而廣泛流行。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大盜阿爾·卡波奈積聚了億萬的資本，充任着酒業托辣斯的首領。一位美國研究家張柏倫不得不承認：『犯罪活動組織的根基，在現存的社會與政治制度中，一定遠比平常所估計的要深得多。罪犯惡黨的領導人有不少是政治組織的成員，並且隨着「禁令」的施行，他們以利用其組織的途徑，大大擴張其在新的有利的剝削場所裏的權勢和影響。在與政治領袖們多年接觸過程中得到的經驗，很便於他們經營啤酒和威士忌的生產與銷售。』

爲了說明美國有組織罪行的性質，看看阿爾·卡波奈的生平活動是有助於研究的。阿爾·卡波奈在三十年代是美國最出名的大人物之一，也是一個最大的資本家（他三十歲那年已有七億美元的資本）。阿爾·卡波奈是盜賊大托辣斯的領導人，是在禁酒輸入法令施行期間，秘密將酒類輸入美國及買賣酒類的組織者。是巨量賊穴的所有者，是敵詐和恐嚇勒索的組織者，芝加哥市的顯要政治人物是奢華的樓房、別墅、汽艇、飛機等的所有者。阿爾·卡波奈手頭集中有很大的政治與行政權力；爲了使芝加哥的警察不去刺探他的犯罪活動，他廣泛地給他們酬勞，使你簡直很難確定這些警察是屬於誰的——是政府的還是『阿爾·卡波奈』托辣斯機關的。

莫洛托夫在描述阿爾·卡波奈是二十世紀美國資本主義的特有象徵時，指出阿爾·卡波奈這最大的資本家，是資本家集團的支柱之一，是美國資本家集團的一條鯨魚——是現代美國解體和腐

燭的體現：「只有用腐爛、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深刻的道德和精神的解體，才能夠解釋這類事實。要知道，對他們是沒法用數字來計算的。」

在駐有淫亂的賊巢的地方，有組織的罪行發展更廣。 · I · 留布林斯基教授會指出說，所有這些罪黨都有著相同的特點：「每一個集體都是一個大托辣斯，經常在一定的城市或州份壟斷該種罪行。它享有一定資本家集團的財政支持，與地方警察署關係拉得很好，它甚至有時還交出不願順從它領導的競爭者給警察署；它安穩地享受地方行政首腦的庇護，並善於經過自己的法律顧問把它的某些人員與法院機關發生的一切「不愉快」圓滿地解決。由犯罪買賣得來的大宗贓物，只在這個托辣斯的個別人員之間瓜分。它的人員須遵守極嚴格的紀律，對「告密者」和叛徒則採取殘酷的報復手段。在美國發生的兇殺案中相當大部分是由於不經審判懲罰違反盜賊紀律分子所致。托辣斯的首領們是富有經驗，又在政治和資本集團中有勢力的人。他們擬定廣泛的計劃，用最完善的技術工作，總之，他們是戰略上指導罪行的人。其次，他們的參謀部擬定各個戰術任務並給作戰單位下達命令。」

大阿爾·卡波奈分子的活動不僅利用犯刑法的罪人，並且還利用美國各實業界。在競爭者之間經濟鬥爭最方便的工具莫過於使用強盜。資產階級還利用強盜的力量與對它不利的分子作政治鬥爭。

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執政者與強盜世界的主宰之間存在的密切關係使得前者能够廣泛地利用後者。往往當一個有勢力的資本主義集團想使自己的競爭敵手服從自己的權勢或根本將他們逐出資本主義舞台的時候，它便去要求惡黨的幫助。這些惡黨便恐嚇所指定的對象，阻礙正常的生產或商業活動，採用暴力和武裝，必要時採取更惡劣手段。

● 「在為社會主義的鬥爭中」。見「列寧托夫哲論集」，第三一五頁。一九三五年版。

有組織的罪行不但在美國的經濟生活中有重大作用的力量，並且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亦復如是。已在前面介紹過的張柏倫在指出罪犯、警察和資本主義世界主要的政治集團之間存在的聯繫時，曾說：『強盜們沒有庇護是不能生存的。罪跡斑斑的大頭目們有了這些緊密的政治聯繫，他們簡直瞧不起警察和其他的官員，因為他們知道任用這些官員的政治機關會督促他們好生對待「夥計們」的。政治組織從這些罪犯那裡取得財政上的支持，並以給予庇護作為酬報。有幾個惡黨黨徒的葬儀提供了在政界與惡黨之間存在密切聯繫最有力的證明，把這種聯繫及其密切程度赤裸裸地暴露無遺。這些葬儀，尤其是不久前在紐約和芝加哥舉行的幾次，其奢華鋪張竟毫不亞於帝王的喪禮，並且在執花圈的榮譽來賓中可以看到許多政府的代表人物親自參加喪禮。』

在研究美國的罪行材料時，不能不回憶一下馬克思關於歐洲帝國主義的話：『工業和商業發展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交易所的投機家舉行自己的世界規模的歡宴；羣衆之貧窮急劇地隨着用欺騙與罪惡換來的揮霍奢侈這種無恥現象而發生。似乎是高居在社會之上的政府，實際上是這個社會最醜陋的東西，是一切流氓行爲的溫床。』

若把各個官方、非官方機關和個別研究家所收集來的關於挑撥離間、諜探、勒索、兇殺等為美國資本家勾結強盜用以對付工人及其職業組織和政黨組織的材料全部蒐集起來，便不能不得出結論說，有組織的罪行是資產階級掌握中的一個重要武器。在資本主義的企業中廣佈着偵探網；這些私人偵探一面與強盜、一面又與官方警察機關有密切聯繫。罷工的時候，便有各種挑撥的行爲照企業主的指示分裂個別工人，實行恐怖行爲等等。特別廣泛佈置的是對進步工人的釘梢。這裡還有美國政府的官方機關——聯邦調查統計局出來援助資本家及與其同謀的強盜。

在一份於一九三一年公佈的總結書中，會提出犯罪世界與地方的政治人物之間的聯系：『刑事法庭和地方行政之間存在極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壓迫着各個反對方面的告發，……這個聯系以註定遭到惡運來威脅告發。在這批不法的地方政界人物和罪犯組織之間也存在緊密的聯系。』前者剝削後者，後者則組織違法與犯罪行爲。……簡直可以稱爲「核准了的犯法制度」。然而，有時這樣的東西在有效能法庭組織存在的時候是不太能施展得開的。所以，這個由不法的地方政客和有組織的罪犯組成的聯盟極力要獲取對有威望的告發者的監察權，而若不能達到這點，則起碼要使整個法院工作成爲無效果和無礙於事。』

馬克思曾對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家的批評諷刺地寫過，他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罪行不僅形成一種特別的職業，並且形成了許多整套的生產部門，說『罪犯此外還生產整套警察和刑事法庭機關、偵探、法官、執刑人、陪審官等等，並且這一切也屬於社會分工範疇的各種職業，發展着人類智慧的各種才能，建立新的需要與滿足需要的新方法。』——馬克思繼續諷刺地說：『……罪犯對生產力發展的影響完全可以從細小的地方觀察出來。假若沒有竊賊的話，鎖鑰會不會達到今天這樣完善呢？若沒有製造假票者存在的話，紙幣的生產會不會達到現在這樣藝術呢？要不是商業中的欺騙，在普通的商業範圍裡會出現顯微鏡嗎？實用化學的發展應該感謝生產中誠實的競爭，但難道不應感謝創造商品和力求發現倣造方法的精神嗎？犯罪用「日新月異」的掠奪私有財產的方法，使得越來越新式的防衛手段得以使用，這影響之良好，如同罷工之於發明機器那樣。』——

馬克思：『剩餘價值論』第一卷，第二四〇——二四一頁。一九三六年版。

● 同上，第二四一頁。